



# 村委会“不管钱”了管什么？

姚丽萍

新民眼

迄今，申城有1593个村民委员会。在人们的印象里，村委会要管的事，无所不包，管粮管钱还要管人。可这个世界变化快，时至今日，村委会的职能还是老样子吗？

日前，《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草案透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村委会的职能，变了，从主管生产转向乡村基层的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

村委会职能转变，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嬗变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资产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

何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资产变股权，让农民当股东。

这项改革，明晰了每个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由村民“共同共有”变为村民“按份共有”，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明晰了产权，改变了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开始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初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在申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2017年，基本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有序推进乡镇级集体资产界定，积极开展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到2020年，本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应改尽改，确保全面完成；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明显推进。

伴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应运而生的，是“三会四权”



孙绍波画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法人财产权、出资者所有权、出资者监督权、法人代理权。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要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民按份享有集体资产、参与经济管理，分享收益，解决长期因为土地征收、资产处置、财务和收益分配管理引发的社会矛盾，就必须从制度上遏制“小官巨贪”。“三会四权”，正是产权改革中保障改革成果的制衡机制，让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投资主体、决策主体和受益主体。

与“三会四权”密切相关的，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平台，纳入全市管理网络，实行实时查询和监管，集体资产管理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闵行区最早建立了农村集体不动产公共招租平台，进一步规范租赁程序，防止低价出租的现象，不断提升产业形态。嘉定区对农村集

体土地、物业出租进行监管，并建立了专门的监管平台，对出租年限、租赁价格、租赁收入到期未收、未及时录入三资监管平台等情况进行监管。

这些变化，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型监督机制得以建立。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如投资、经营、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都由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原来由少数干部掌控，乃至随意支配集体资产、监督缺位的状况，由此改变，“小官巨贪”也因此得以预防。同时，这些改变也有效地遏制因资产处置不公、收益分配不平等引发的上访现象，较好地化解了党群矛盾、干群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无论是“三会四权”，还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信息平台，都让“钱的事”有了新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制度，这也为村委会从经济管理中抽身，实现职能转变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

障。此后，村委会又将如何致力于乡村基层社会的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法规草案给出的思路是：开展农村社区民主协商。那么，谁来协商？协商什么？怎么协商？

法规草案第33条说：围绕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事项，村委会组织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驻村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非本村户籍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邀请政府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民主协商。

换言之，要协商的，是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来协商的，身份多样；协商方式，不拘一格。

就这样，在今后的日子里，村委会将依法转变角色，不管钱了，但身上的担子却不轻——乡村基层是否井然有序，村民自治是否充满活力，还要看村委会的本事。

“有时候你越在乎对方，可能就更容易吵架。如果不吵架了，那意味着对彼此失去了信心，离分手就不远了。”

——当地时间11月22日，正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工商界午餐会上演讲时说。他表示，中美经贸关系越密切，分歧和摩擦也就越多。积极面对分歧，有效化解分歧，正是中美经贸合作强劲的动力。

“好，我不挂电话，我再教你人工呼吸。”

——武汉120接线员刘清说。日前，一段120接线员与求救者的26分钟对话令万千网友泪奔。电话里，刘清冷静而耐心地教求救者对其心脏骤停的丈夫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抢在急救医生到来前施救，最终挽回病人生命。

“我走过去，准备扶时，看见周围没任何人，又放弃了，然后默默离开。回头看，老人试图爬起，又失败了，又爬起，又失败了，路过了几批行人都没有去帮助，不知老人后来咋样！但突然还是感觉良心在挣扎！”

——宜宾一名网友“宜宾江哥”在朋友圈上说，他前几天在路边看到一名老人突然倒地，却怕被赖，犹豫未扶。得知老人最终去世后，他十分自责。

“学校收的学费有三百万，但也不够奖金发放，我作为投资者，是卖了老家的两套房子，凑了六百多万，才补上了发放奖金的资金缺口。教育要讲诚信的，在招生时奖励制度已经贴出来了，就要兑现承诺。”

——浙江温州苍南县一家民办中学董事长林元洲说。该校给中考成绩优异的高一新生发放了近800万元奖学金，网友直呼“土豪、有钱任性”。不过，苍南县教育局中学教育科认为设置高额奖学金的做法欠妥当，会进一步调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仕民教授认为这样的做法不能成为长效机制。

“说好是公益讲座，为啥中途推销产品？学校还向家长发信息，还发调查表要求写观后感！”

——多位四川省通江县实验小学学生家长反映。前不久，家长收到学校通知，前去听一场孔子学堂宣讲报告会，讲座中途却被推销“读音机”和《经典诵读全书》，一套1600元。

## 声音·热点

# 专家议中国传统村落空巢化、旅游化

“我们的村民不热爱自己的乡村文化，这也怪不得村民。因为城市文化离他们的生活向往更接近，他们有权过上更现代化的生活，而他们认为自己习惯的文化已经过时了、麻木了，认识不到村落文化有什么价值，甚至认为，古村落能够旅游、能够赚钱，才有价值。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让人们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人们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没什么太大变化，而这30年间，改革开放、外来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等突然一股脑涌进来，村落里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尤其对深层的精神文化等问题毫无准备，对于如何保护，一时拿不出办法，也是必然的。”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骥才剖析传统村落旅游化的深层原因。

“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一个样子，只用了20年时间，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我们的村落这么

7136个传统村落正在网上公示，其中2555个已经正式进入国家保护的视野，但依然阻挡不住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很多纳入国家名录的村落已经面目全非。在日前召开的“何去何从·中国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村落“千村一面”，空巢化、旅游化的现象忧心忡忡。

发展下去，再过10年或者15年，几千个传统村落就会和现在的大城市一样“千村一面”，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冯骥才焦虑的是，千城一面的悲剧正在传统村落中重演。

“关注民族传统村落的村民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第一要素。传统村落保护应该在国家立法的基础之上，由地方政府部门开展普查，确认传统村落的级别，实施不同层次的保护开发措施，形成健全、完备、具体的保护方案。要建立严格的农民参与机制，保护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乡村符号、故乡记忆。”

——中国民协党组书记邱运华

“德国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采取博物馆方式，在馆中展示人们的生活方式、农作方式、作物产出等，给参观者直观的体现。此外，德国对传统村落还予以特殊条例保护，为村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德国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席、综合历史遗产保护成果鉴定专家鲁道夫·吕克曼

“当我们谈到‘传统村落保护’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以保护村落传统景观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保护并不止于景观，还是要整体呈现生活和文化环境。”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菅丰

“没有不变的村落。一座村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最初的形态，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为了确保生活的便利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改变，这就需要古村发展过程中充分考量保护传承的问题。”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日本民俗学会会长福田亚细男

“对于城里人来说，村庄的各种资源是具有吸引力的，包括农耕的土地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等。很多农民由于增加了经济收入而留在村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村庄解体的危机。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村民主要不是依靠原有的耕地和亲属合作关系进行生产，而是面对着一个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可能会造成村民之间在旅游资源上的争夺，因此特别需要整合与合理分配各种资源，增强村庄整体的竞争力。”

——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铁梁

本栏编辑 姜燕



关注时事热点，聆听八方声音，敬请关注本报微信“新民眼”。